北 京 文 化 通 讯

第三期

本期要目

政策导览

- 文化部日前制定并下发《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文化领域的实施意见》

动态关注

- 北京市成立全国首家省级国有文化资产监管机构——“文资办”
- 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发布《2011 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报告》

媒体聚焦

- 繁而不荣：中国动漫产业的“虚胖症”

尖峰观点

- 众学者谈回归十五年，向香港文化学习
- 门格：欧洲的文化政策——从国家视角到城市视角

学界观察

- 黄鹤、郑皓：国际视野下北京城市文化设施比较分析
- 刘敬严、李占平：农民工市民化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Institute for Cultural Studies,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1. 政策导览

（1）政策文件

■ 文化部日前制定并下发《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文化领域的实施意见》

文化部日前制定并下发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文化领域的实施意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文化领域。

《意见》认为，民间资本已成为推动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繁荣文化产业、推动文艺创作生产、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意见》明确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投资文化产业发展、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和参与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

《意见》表示，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以投资、控股、参股、并购、重组、项目合作等多种方式，积极参与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并可享受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和国家扶持文化企业发展的相关优惠政策。民间资本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捐赠捐助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可按有关法律法规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对民营文化企业在立项审批、投资核准、项目招投标、政府采购、评比表彰、申请专项资金、享受税收优惠、申报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和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等方面，要与国有文化企业一视同仁，不得对民营文化企业设置任何附加条件、标准和程序。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的金融机构、中介组织、各类投资基金进入文化产业领域。

鼓励民间资本建立信息平台和社会中介组织，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搭建桥梁和纽带。鼓励民间资本通过设立公益性基金等方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如对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对代表性传承人及学艺者予以资助等。

鼓励和引导民营文化企业向规模化、集约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努力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扩大我国优秀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规模。鼓励民间资本通过新设、收购、合作等方式，在境外设立文化企业、收购文化设施、建立分支机构等。

《意见》提出，今后将为民间资本进入文化领域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并加强对民间资本进入文化领域的指导和规范管理。全面梳理文化领域各项行政审批事项，为民间资本进入文化领域提供公开透明、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清理和规范涉企收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逐项落实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文化领域的各项政策措施，不断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协助民营文化企业了解和分析海内外文化市场动态，拓展营销网络和渠道。同时，加强对民间资本进入文化领域现状、发展趋势的监测和分析，把握民间资本进入文化领域的动态，适时修订《文化部文化产业投资指导目录》，合理引导民间投资者正确判断形势，减少盲目投资。

（据《经济日报》摘编，2012 年 7 月 3 日）

■ 刘淇在北京市十一次党代会上提出首都建“世界城市”目标

2012 年 6 月 29 日上午 9 时，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刘淇代表中共北京市第十届委员会作了题为《全力推动首都科学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而努力奋斗》的报告。

报告回顾了过去五年北京市各项事业取得的主要成就，具体表现在：圆满完成筹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和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庆祝活动等历史性重大任务；综合经济实力显著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高，地区生产总值超过 1.6 万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 1.2 万美元，

地方财政收入达到3006亿元；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城乡一体化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城市建设管理水平大幅提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稳步推进，首都文化繁荣发展呈现新态势等。

今后五年，首都推动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建设的主要奋斗目标是：1.经济实力显著提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万美元左右，在2020年率先形成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双轮驱动”的发展格局。2.城市功能持续优化，交通拥堵得到有效治理，中心城区公交出行比例力争达到50%；“智慧城市”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3.社会环境更加和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明显提高，社会服务管理体系更加完善，人口管理更加科学有序。4.首都文化日益繁荣，全面践行“北京精神”，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质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全国文化中心的示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5.改革开放不断突破，努力建设国际活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企业总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人才聚集之都。6.市民福祉明显改善。

今后五年，要努力在六个方面取得新的重大进展：1.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加快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步伐；3.努力开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新局面；4.全力推动首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5.全面推进社会建设和服务管理创新；6.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刘淇要求，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

（据《新京报》摘编，2012年6月30日）

（2）政策解读

■ 蔡武谈推进文艺院团改革的五个“坚持”

党的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关于深化国有文艺演出院团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下发以来，文化系统以转企改制为中心环节，着力打造合格演艺市场主体，不断拓展演艺市场，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发展的新路，以企业为主体、事业为补充的演艺体制格局正在形成。在改革进程中，通过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并努力上升为规律性认识，形成了以下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的重要思想认识：

坚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思想观念解放的程度，直接影响着改革的深度和广度。长期以来，有些单位和个人对改革一直存有观念障碍，为了统一认识，我们在改革中不断加强正面宣传，反复强调文化体制改革战略部署的重大意义，阐明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的实质、前景和改革保障措施，为改革的顺利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坚持面向市场、面向群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院团只有积极面向市场，才能更好地服务群众。国有文艺院团要通过转变体制机制，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增强活力、提高能力，努力打造经得起市场和群众检验的精品力作。这些年，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紧紧抓住转企改制这个中心环节，逐步打破了以往“以行政为中心，以得奖为目的”的生存模式，建立起以观众为中心、以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统一为目标的院团经营管理体制。

坚持以人为本、保障权益。改革的力量源自群众，只有坚持走群众路线，保障好干部职工的合理权益，改革才能顺利进行。一是在改革过程中充分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保障转制院团演职员工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二是善解决转制院团演职员工关心的现实问题，保障好转制职工的合法、切身利益；三是不断强化“早改革、早受益”的政策导向，调动改革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让广大演职员工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坚持实事求是、分类指导。国有文艺院团艺术品种众多，情况千差万别，改革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采取分类指导、“一团一策”的方式加以推进，避免“一刀切”。在长期的改革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五个一批”，即转制一批、整合一批、撤销一批、划转

一批、保留一批的改革路径。一方面，坚决把转企改制作为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和工作重点，对于大多数一般国有文艺院团，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的方针实行转企改制，着力培育现代演艺市场主体。另一方面，区分各类各级国有文艺院团的不同情况和功能，采用多种路径推动改革。

坚持完善政策、加强扶持。长期以来，国有文艺院团底子薄、基础差、包袱重，要认真落实中央支持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的各项政策，在保证和增加财政资金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落实“一团一场”优惠扶持政策、鼓励和支持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解决退休待遇差问题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逐步加大对转制院团发展的扶持力度，在政府采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艺术类评奖等方面更多地向转制院团倾斜。在“谁改谁受益”的系列优惠政策扶持下，广大转制院团市场竞争能力和发展后劲日趋增强。

（据《人民日报》摘编，2012 年 6 月 5 日）

■ 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谈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2012 年 6 月 9 日，在文化部主办、国家图书馆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合承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系列讲座”上，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指出：

近一个多世纪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依存的环境和土壤逐渐受到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着严峻形势：一是传统文化流失，二是片面强调经济发展，三是社会道德滑坡。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刻不容缓。2005 年国务院先后下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从 2005 年到 2011 年短短 6 年就完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立法工作，人们已经形成了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共识。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上讲，尚处于起步阶段，任重道远。

（一）必须提高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重要意义的认识。特别需要整合政府、学校、社会等多方力量，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作用，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

（二）吸引民众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各级政府应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进行规划和部署，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机构和研究机构。首先，要完善教育传承机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其次，要加大宣传力度，在重视和发挥传承人核心作用的同时，要借助文化遗产日、中国传统节日和各地举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等平台，广泛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提高人民群众的参与意识和保护意识，并使群众在保护中共享保护成果。

（三）从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的高度，积极推进生产性保护。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优势，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当代社会、融入生产生活，同时能够增加传承人的收入，促进地方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同时，“保护为主”，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利用，开发是为了保护，不是为了开发而开发，更不能纯粹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破坏性开发。

（四）从维护文化生态平衡的高度，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应在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且有着深厚文化生态环境的区域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对区域性文化生态进行全方位和整体性保护。

（五）加强人才队伍和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加强传承人队伍建设，对已入选各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要采取有效措施，重点加强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二是加强保护工作队伍建设，建立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加强业务人才培训工作，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培养一批既懂业务又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进一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各

类专题博物馆、民俗博物馆和传习所建设，并积极争取各级财政的支持，建设一批国有性质的综合性或专题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设施，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设施建设。

（据文化部网站摘编，2012 年 6 月 25 日）

2. 动态关注

■ 北京市成立全国首家省级国有文化资产监管机构——“文资办”

2012 年 6 月 18 日，本市文化体制改革推出重大举措，全国首家省级国有文化资产监管机构——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文资办”）正式成立。

经中编办批复同意，市文资办为正局级单位，列入北京市政府直属机构序列。市文资办的成立，是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进首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举措。

市文资办成立后，将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推进六项工作：1.建章立制，完善各项制度，理顺国有文化资产监管体制机制；2.按照市政府授权和“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原则，履行政府出资人监管职能，确保国有文化资产保值增值；3.推进文化企事业单位改革重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打造“文化航母”；4.促进文化产业发展，落实文化创新、科技创新“双轮驱动”战略，整合中央和市属资源，培育文化新业态，推动文化与科技、金融等领域融合发展，做大做强文化产业；5.发挥文化创新发展专项资金作用，推动文化领域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落地，健全文化投资融资服务体系，放大政府资金效应，为首都文化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6.与各兄弟部门密切合作，为推动首都成为全国文化精品创作中心、文化创意培育中心、文化人才集聚教育中心、文化要素配置中心、文化信息传播中心和文化交流展示中心做出积极努力。

成立仪式上，市文资办负责人与国家开发银行北京市分行、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等 10 家银行签订文化金融创新发展合作协议，10 家银行为北京文化产业发展每年提供 1000 亿元授信额度；万达集团 11 家企业与市文资办签订文化创意发展合作协议，签约项目总投资额达 608.7 亿元。

（据《京华时报》摘编，2012 年 6 月 19 日）

■ 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发布《2011 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报告》

2012 年 6 月，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出版发行《2011 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报告》。该报告由文化部文化市场司主编，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提供学术支持。

《报告》发布的目的在于从政府的宏观层面了解我国艺术品市场在全球艺术品市场所处的地位，客观认知我国艺术品市场的发展现状，分析当前的制约因素，展望近期发展趋势，从而制定出符合艺术品市场经营特点的法规和行业规范，更好地规范和促进我国艺术品市场的发展。

报告分成 2011 中国艺术品市场概况、影响力分析、政府政策与行业规范、市场结构分析、国际市场概况、国际地位和市场作用、2011 年中国艺术品市场大事记七部分。

2011 年我国艺术品市场的整体规模继续呈现快速增长，市场交易总额达到 2108 亿元，名列世界第一，年增长率 24%。国内的画廊、艺术品拍卖企业和艺术品博览会虽各司其职，但又以艺术品交易为主轴，逐渐加强了彼此之间的扭和与协作，推动了国内艺术品市场结构性优化的进程。另外 2011 年艺术投资基金、艺术品信托为代表的新经营主体均表现活跃，艺术品网络交易也渐成共识，成为突破传统交易模式的新尝试。中国艺术品市场作为一个日趋国际化的产业平台，将成为传承文化的有机载体，并带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带动现代服务

业品质提升，带动城市生活美好升华。

报告运用统计学定量分析的方法，对中国艺术品市场进行客观分析，以厘清市场内部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报告还运用历史研究和文献研究的方法，通过历史性的比对以及重点引用国内外专业研究机构的重要研究成果，在宏观、微观两个层面上对中国艺术品市场现状及其变化特点进行考察。此外，报告还大量运用调研法，以画廊、艺术品拍卖公司、艺术品博览会为分析对象，采取问卷、访谈等方法，为分析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据文化部网站摘编，2012 年 7 月 2 日）

■ 2012 年城市可持续发展北京论坛闭幕

“2012 城市可持续发展北京论坛”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闭幕。论坛期间，共 21 个投资项目成功签约，签约金额达 462 亿元。丹麦的哥本哈根与北京签署缔结友好城市关系协议，成为北京市第 47 个国际友好城市。

本次论坛共吸引了 24 个城市的政府、企业家、展览机构，约 300 位国际友人参加。除举办三场“专题论坛”外，总面积 3200 平方米的“城市展览”、多个国家艺术团体参与的“城市艺术节”、企业家论坛等活动也同步展开。21 个大项目在“第四届投资北京洽谈会暨 2012 城市可持续发展北京论坛企业家论坛”上签约，其中，涉及高科技、文化创意、促进北京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等方面的 13 个重大项目，签约金额就达 419.6 亿元人民币，占总签约金额的 90.8%。境外投资者也为北京的创新环境吸引，德国戴姆勒、法国迪卡侬等外资大企业都确定将加大在京投资的力度。外资投资项目签约金额均在 3000 万美元以上，总额为 11.38 亿美元。

论坛中，世界各城市的代表为北京可持续发展积极建言。

英国伦敦和以色列特拉维夫-雅法市的两位代表不约而同地建议北京发展“夜间文化”，特拉维夫-雅法市副市长阿萨夫·扎米尔更是建议，北京不妨也尝试一下“夜间跑步”。

城市饮用水短缺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而目前哥本哈根的水泄漏率只有 7%，哥本哈根市长弗兰克·延森提出，期待在包括水资源在内的很多方面与中国企业合作。此外，哥本哈根还制定了很好的自行车体系，50%的人通过自行车来上下班和上下学。据城市计划，在二氧化碳削减领域，市民将参与到城市的风电发展，他们购买股份，支持城市建设目标，希望在 2025 年把哥本哈根变成世界上第一座实现二氧化碳排放中和的首都。

交通拥堵已成了世界各大城市的“通病”，各大城市的代表分享了城市治理交通拥堵的措施和策略。伦敦以收缴“拥堵费”的方式缓解交通压力，并在市中心设立了众多自行车出租店，鼓励居民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华盛顿也是通过增加私家车使用成本的方式来控制其数量，还鼓励居民骑自行车出行，建设有轨电车体系、加大步行道建设。日内瓦则计划在 9 月份进行一项投票，准备把 15 条街道封闭起来，禁止汽车通行，鼓励步行。

（据《北京晨报》摘编，记者邹乐，2012 年 6 月 29 日）

3. 媒体聚焦

■ 繁而不荣：中国动漫产业的“虚胖症”

编者按：国家广电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 年我国制作完成的电视动画片共 435 部，261224 分钟，比上年增长 18%。这一数据意味着，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动画生产大国。而根据近期发布的《中国文化品牌发展报告(2012)》，目前国内 85%的动漫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大部分企业都在靠政策补贴艰难维生，中国动漫产业呈现出繁而不荣的尴尬局面。

有学者提出，在全国都在大力扶持动漫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重生产而轻市场的问题，大量无意义的生产像一把虚火，使动漫产业呈现出一种病态。在近期举行的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期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视觉效果奖得主安东尼直言不讳地说，现场展示的动漫形象和作品几乎没有能引起人注意的。他认为，中国有很多独特的文化，非常吸引人，但由于太缺乏讲故事的能力和想象力，所以制造出来的东西模仿痕迹太重，让人看不到新意。在这种背景下，有人提出，我们应该适时地调整对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将“质”和“量”区别对待，以促进动漫产业向精品路线的转型。（据《中国成为动画生产第一大国，为何85%动漫企业亏损》，《中国青年报》，2012年6月28日）

《新华每日电讯》的文章就对当前扶持政策的弊端进行了深入分析。文章认为，从扶持的题材上看，很多地方政府都热衷于扶持那些地方色彩很强的动画片，最近引起广泛争议的《戚继光英雄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此现象，有人解读说，地方政府之所以倾向于支持红色文化、地方文化题材的动画片，一方面是出于当地宣传的需要，另外一个原因是，这样的题材最“保险”，肯定不会出什么问题。从扶持的对象上看，当前的扶持政策倾向于选择那些规模较大的企业，而动漫产业的特点是，规模大不一定能出精品，很多走市场路线的公司都是从一二十人的规模慢慢成长起来的。在这点上，我们与英国的做法恰恰相反，他们更强调小型的工作室。从产业经济的角度看，扶持小企业能起到一种平衡作用，让资金不至于集中到大企业。文章还提出，文化精品的培育是一个长期过程，我们不应该抱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据王学良、秦路：《动画产业基地：不能只求“分钟”不练真功》，《新华每日电讯》，2012年6月15日）也有文章批评了国产动画片整体上存在的“低智化”现象。文章认为，现在制约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已经不是技术，而是原创力缺乏。深圳早已成为世界知名的动漫制作代工基地，《功夫熊猫》等知名动漫作品就曾在这里制作，但是，我们可以为别人做嫁衣，却不能为自己织出一件漂亮的礼服，这不能不让人深思。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虽然动漫制作技术已趋于成熟，但整体构思的“低智化”现象却极其严重，包括我们津津乐道的“一只羊”。（据禾刀：《“虚胖”的国产动漫如何超越“一只羊”》，《新华每日电讯》，2012年6月29日）

由于恰逢“六一”儿童节，与国产动漫相关的儿童电影也饱受诟病。有学者提出，当前国产儿童电影的创作水平太差，里面的孩子大多是“假孩子”、“纸孩子”，说着剧作家让他们说的成人化的语言，不真实也不可爱。他们要么见义勇为，要么犯了错误马上就改，缺少质感和童趣。（据《万人民调：51.2%受访者直言国产儿童电影整体质量差》，《中国青年报》，2012年6月28日）也有学者指出，儿童电影的一个重要理念是，要俯下身子倾听儿童的呼声，用孩子的眼光看待世界，用孩子的思维思考问题。虽然儿童电影应该有教育职能，但前提是要符合孩子的心理，不能片面强调儿童电影的深刻性和含义，而忽视了儿童的心理特点。目前，我国接近一半的儿童电影是“儿童社会问题片”，比如反映失学、留守儿童等主题，这些电影本身很好，但是更适合给大人看，给政府看，社会生病不能给孩子吃药。我们可以有选择地给孩子看一两部这样的电影，但看多了反而会对他们的身心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据《国产儿童电影只有摸准孩子的脉才会获得市场回报》，《中国青年报》，2012年6月28日）也有文章提出，国产儿童电影的创作理念也应该有所创新，国外早就把儿童电影当作合家欢的家庭电影，并把它作为一个高效益的产业程序来制作。国外家长买票和孩子一起看电影是为了分享交流、释疑答惑，而国产儿童片却鲜有受到儿童和家长共同喜欢的。（据孙仲：《国产儿童片能否走出“弱智”阴影》，东方网，2012年5月31日）

■ “最”现象与极端主义文化

编者按：从6月12日起，《人民日报》就“我们时代需要怎样的价值”相继刊发5篇评论文章，对“精致的利己主义”、“狭隘的极端主义”、“庸俗的消费主义”、“诡辩的相对

主义”以及“不加分析的怀疑主义”等 5 种所谓“价值”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痛快淋漓的挞伐。其中，对“狭隘的极端主义”的批判引发了最多争议，一些媒体对此给予关注，并将它与当前流行的各种“最”现象联系起来。

《人民日报》评论文章指出，当前，围绕一个具体事件，常常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极端化意见。不仅一方根本不理会另一方，即使是中允的看法，也往往会“两头不讨好”。文章还列举了各种极端主义现象：因为有消极腐败现象，就把国家说得一无是处；因为有为富不仁，就对所有富人怨、恨、怒；批评社会存在一些矛盾，就被斥为“抹黑中国”；强调一下阶段性国情，又被讥为“高级五毛”；看到国企亟待改进，就干脆主张全面私有化；指出国企问题不少，就是对公有制的“攻击”；小悦悦事件发生了，就断言世风日下已至道德末日；“最美”出现了，又认定道德滑坡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极端思维，在我们身边并不鲜见。不管是哪个极端，都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真实判断我们所处的方位，客观评价国家社会的进步，更无益于形成社会合力、促成问题解决。（据江柳依：《摒弃“狭隘的极端主义”》，《人民日报》，2012 年 6 月 14 日）

有文章评论说，这是一个很有洞见的观察，抓住了当下舆情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我们讨论“极端主义”问题，不能仅仅停留于浅层的道德批判，更要反思其产生的现实土壤——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了极端主义？文章总结出三个主要原因：首先，极端主义是由网络传播的特点造成的。在网络上，客观理性的观点很难吸引眼球，于是，很多人就把极端的判断当作吸引注意力的手段。尤其是微博兴起以后，140 字的篇幅限制更是加剧了言论的极端化，挤压了理性表达的空间。其次，它也受到了一些媒体的误导。一事当前，某些媒体不是客观地报道真相，而是热衷于为它贴上“官二代”、“富二代”之类的极易点燃社会情绪的标签，以吸引眼球。最后，导致极端主义泛滥的一个最根本原因是阶层的两极化。在贫富差距拉大的现实下，少数富人垄断着财富和资源，为数众多的穷人充满着“相对被剥夺感”，而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层则并未壮大，这是一个危险的失衡和断裂状态，极易滋生极端主义情绪和思维。因而，要化解中国当下舆论空间中的极端主义，需要新媒体的净化，需要民众的理性，需要媒体的职业自律，更需要解决贫富拉大这个制度性问题。（据曹林：《批判极端主义，也要反思现实土壤》，《中国青年报》，2012 年 6 月 15 日）

也正是这种极端主义思维方式，造就了我们当前社会中的各种“最”现象。要么是最美司机、最美女教师；要么是最冷漠路人、最毒后妈。其实，这不是割裂开来的两个中国，而是一个复杂的中国；道德现实也不像极端主义所评价的那样，或是道德沦丧，或是道德完美。如果人们对当下的道德现状缺乏一个客观、稳定、现实的评价，就很容易随着个案而摇摆，被突然曝出的个案牵着鼻子走。（据曹林：《脚踏现实，莫被“最 X”迷住眼》，《新华每日电讯》，2012 年 6 月 15 日）也有文章从另外的角度提出，“最美”现象的出现，标志着网络文化正在与主流文化融合。在互联网传播初期，曾经有一批人以猎奇和审丑的心态看待网上的一切，“芙蓉姐姐”就是其产物。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现实社会中人们的好恶判断越来越真实、准确地投射到虚拟社会中，这时主流价值观就开始在网上进一步凸显。经过 20 年的发展，从审丑到审美，网络“正能量”正在不断累积和发酵。（据《“最美”现象凸显网络主流文化雏形》，《东方早报》，2012 年 6 月 6 日）

4. 尖峰观点

■ 门格：欧洲的文化政策——从国家视角到城市视角

欧洲的文化政策模式深深植根于福利国家学说，它与教育政策、社会政策和医疗政策是同步实施的。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它走过了四个发展阶段。当前，欧洲在制定文化政策时面临的一个主要困境是，如何在文化民主化理念与效率原则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这也体现了

文化政策制定的国家视角与城市视角之间的矛盾。从国家的视角看，文化政策的制定应该基于一种民主化理念，促进高雅文化在社会层面和空间层面更为均衡的分布；而从城市的视角看，效率法则应该被放在首位，文化政策应该支持那些能给国家带来声望，并使国家在国际文化舞台上占有更重要地位的大城市。

因而，一个城市在制定文化政策时，它所强调的重点就与国家的文化政策不同。我们常常会面临以下矛盾：以国家为中心的政策追求平等主义，但某种程度的不平等可能会激发文化的创造性和活力；大城市的艺术威望有益于整个国家的威望，但与这些大城市不相上下、却没那么幸运的城市则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多元主义和世界主义可能是创造性的来源，但它要付出的代价却是社会的日渐隔离和两极分化。所有以上这些矛盾，都是我们在制定文化政策时需要考虑和解决的困境。令人欣喜的是，创意产业的发展让人看到了希望，由于创意产业既能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福利，又能保障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创意产业是解决当前文化政策制定过程中民主化理念和效率原则、国家视角和城市视角之间矛盾的方式之一。

（据皮埃尔-米歇尔·门格：《欧洲的文化政策——从国家视角到城市视角》，《国外社会科学》，2012 年第 3 期）

■ 众学者谈回归十五年，向香港文化学习

从 1997 年到 2012 年，香港回归已经十五年了。不知不觉间，香港的许许多多，已经融进了无数内地人的生活。不论是流行元素、时尚生活，还是消费主义、法律意识，乃至文化观念、生活方式，内地在改变着香港的同时，香港也在浸润着内地，而且未来这种影响还将继续下去。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河认为，香港文化对内地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大众文化和市民文化。这种文化并不是粤地的地方文化，而是一种与东南亚市场相适应的产业文化；同时，它也是一种轻松的、休闲的、去意识形态的世俗文化。其次，香港流行文化促进了粤语在内地的广泛流传。2005 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收录的粤语词汇有上百条之多，其中就包括我们今天经常使用的一些词汇，如“打的”、“埋单”、“养眼”、“搞笑”等。第三，香港的流行歌曲、电影电视、通俗读物等在内地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一代人的文化记忆。最后，在文化产业的管理模式、媒体的运作方式上，内地也受到了香港流行文化的影响。

随着内地大众文化市场越来越多元，更多的外部文化，如欧美、日韩等国的文化越来越多地被人们了解和接受。而且，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积累，内地文化本身也逐渐有了自己的特点和地位。因而，不可否认的是，香港文化对内地的影响力在变小，但这并不意味着香港对内地的影响已经完结。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认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香港还将继续潜移默化地影响内地。首先，香港是一个法制发达的地区，它的法制观念对内地的影响巨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零容忍”。其次，香港是一个非常讲求效率的地方，不仅普通人追求高效，而且，行政机构的高效也是世界领先的。此外，香港也是一个能够包容多元文化的地方，它既有东方传统文化，也有舶来的西方文化，还有许多其他民族的文化，香港的这种兼容并包精神也影响着内地的许多城市。最后，香港还是一个有很高社会认同感的地方，大部分香港人都当自己是国家，是公民，他们不会对社会负面现象无动于衷，因为他们知道，很多事情看似损害的是某个人的利益，但最终伤害到的是法律和社会正义。香港人的这种认同感，也是当前内地所欠缺并亟需培养的。

此外，文化批评家叶匡正也强调，香港的公共舆论氛围、公民参与意识、批判性的经济学观念，还有学术观念的传通，都对内地的政治文化生态状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据《十五年：向香港文化学习》，《北京晨报》，周怀宗采编，2012 年 7 月 1 日）

■上海电影节热议华语片的救赎之道

根据今年年初中美两国签订的电影协议，中国以后每年将增加进口美国影片 14 部，美国票房分账比例也从 13%提高到 25%。如此一来，好莱坞电影势必给中国电影人带来更大的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直面市场，建立起自己的行业话语权，如何更好地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成为第 15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的热门话题。

“找一个好故事”成为电影导演、电影公司和投资商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很多人认为，在今天的中国，资本、观众、市场等各项硬件配置已经空前完备，但国产电影的表现仍远未达到与之相匹配的高度，其关键原因在于内容创意的相对滞后，在于好故事的稀缺。那么，好故事在哪里呢？作家刘震云提出，一个作者或导演能否写出或拍出好的作品、能否讲述一个好故事，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见识问题，一个有见识的人一定能找到一个适合他见识的故事。导演王小帅提出，中国电影之所以缺少好故事，关键原因在于没有面对现实，对当下各种现实问题集体失语。

很多人也意识到，我们不能把中国电影的全部责任都推到导演身上，而应该从电影工业的各个环节寻找原因和对策。在制作方面，导演唐季礼提出，怎样让中国电影“走出去”，核心是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人才培育环境，要在科技、教育、交流、融资等各个方面都创造一个好的环境。星美影业董事长覃宏从发行角度提出，现在中国电影的屏幕数量要比几年前高出很多，但还远不具备风险发行的能力，几乎所有的院线上映的都是同一些影片，没有进行差异化放映。为了打破这种状况，国家可以加大对影院放映国产电影的补贴。

长久以来，华语影片有两种主要力量：一种是为国内市场而做的商业片，另一种是为国际口碑而做的所谓“电影节影片”。但是，是否存在一种既受市场欢迎又被国际电影节认可的影片呢？陆川认为，我们应该学会尊重观众，好莱坞电影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它的语言和制作都是尊重观众的，不会强求观众去接受一次灵魂的教育。贾樟柯认为，即使是商业片的导演，也应该对电影美学和艺术质量有自觉追求，不能为了迁就商业而牺牲艺术，因为电影成功的关键还在于影片的艺术质量。

（据钱力：《第十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热议华语片救赎之道》，《中国文化报》，2012 年 6 月 21 日）

■ 边芹、郑若麟：解读戛纳电影节的评奖标准

当 2012 年戛纳电影节把金棕榈奖颁给哈内克的《爱》时，它又一次完成了“同性繁殖”。戛纳电影节已经成为一个文化偏见型、利益垄断型的电影节，三大因素决定了它的选片标准和评奖标准，即制片人的利益、赞助商的利益和西方的国际战略需要。从今年入选和获奖的影片看，这种标准更加清晰，即入选影片日趋“传统化”、电影投资“趋利化”、政治上“正确化”。

戛纳电影节越来越运用双重标准：当法美等国的电影投资越来越趋于赢利，法国向外投资合作却越来越寻找“边缘化电影人”；当“第一世界”的选片越来越向市场靠拢，使得电影宫成为欧美片商的广告廊，“第三世界”的选片却日益承担国际政治斗争或艺术探索的使命；当美、法、加、韩大拍虚构故事，南美、东欧、非洲、伊斯兰地区却清一色的社会写

实；当死亡在欧美电影中是个人悲剧，到了其他某些国家就变成——甚至是必须变成——社会或体制的因素……这些都是电影节牢不可破的“政治正确”，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没有读懂戛纳。

戛纳电影节也越来越“趋利化”。比如，2007 年韩国 LG 集团与戛纳电影节建立了合作关系，此后，韩国电影在戛纳的影响就不断上升，今年进入“主竞赛单元”的韩国影片就有两部。此外，自欧莱雅与戛纳建立合作关系以来，共有 35 位明星签约成为“欧莱雅女郎”，她们每年都受邀来走红毯，在电影艺术的掩护下，“电影明星”演化成了“商品推销员”。最后，戛纳电影节的“政治正确”标准也非常明显，这些标准与西方的国际战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讽刺挖苦小布什的电影《华氏 911》得到戛纳青睐的时间，与美国统治集团决定将布氏抛进泥潭以便翻过历史一页的时间，正好是重合的。再比如，日本电影人可以送来纪念军国主义信徒的电影（今年，表现日本极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自杀壮举的电影入选了“一种注目”单元），而德、法等国则绝不可能放出任何一部质疑“二战”官方历史的电影。

（据边芹、郑若麟：《杰作由谁说了算——再谈 2012 戛纳电影节》，《文汇报》，2012 年 6 月 23 日）

5. 学界观察

■ 黄鹤、郑皓：国际视野下北京城市文化设施比较研究

在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目标之后，许多学者开拓国际化视野，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北京市文化建设的优势和不足，提供了较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黄鹤、郑皓将北京与伦敦、纽约、巴黎、东京四大代表性国际都市并置，采用大量调查数据，分析了北京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

从数量规模来看，北京市当前的文化设施绝对数量不小，属于公益性文化设施的博物馆有 105 个、公共图书馆 305 个、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等达到 337 个，经营性设施中电影院有 170 家、剧场剧院也有 73 家。但由于北京市的人口远大于大伦敦地区、东京都和纽约这样的国际都市，所以人均文化设施数量较少。

从空间分布上讲，北京的文化设施的分布有自身特色。公益性设施主要分布在长安街、市区中轴线以及北部、西部地区，而经营性设施受市场影响大，主要集中在市区东部和北部。目前来看，北京市区已经基本形成了 15 分钟文化圈，这也和代表性国际都市的文化设施分布规律相符合。

从利用状况角度分析，北京市的文化设施级别越高利用率越高。2010 年全市区级以上图书馆外借图书达到 947 万册，区级以上档案馆利用人次 13.38 万次，全市电影观众达到 2923.3 万人次。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基层文化设施运营情况不甚理想，大多数村属、社区属的文化设施面积狭小、不堪使用；二是经营性文化设施的规模和影响力还有不足，比较国际都市差距明显。

作者认为，在比较北京与代表性国际都市的文化硬环境的优势和不足的同时，要注重对这些实际情况形成的内在动因的审视，注重文化软环境的提升。

（据黄鹤、郑皓：《国际视野下北京城市文化设施比较分析》，《北京规划建设》，2012 年第 3 期）

■ 刘敬严、李占平：农民工市民化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研究

当前的农民工市民化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刘敬严、李占平两位作

者认为，以实现自我价值增值为动机的农民工城市化，能否给农民工和城市市民之间带来和谐共处，关键在于文化认同。而目前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普遍社会地位较低、经济水平弱势，没有能力满足自身文化生活需求，而应该为农民工群体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现在还很匮乏。其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政府投资不到位，二是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工享受文化服务的权利，三是农民工的工作特点使其缺乏进行文化生活的动力。

为此，作者提出应从两个层面上解决问题，首先应该改善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理念，坚持以人为本、消除身份歧视、建立健全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二是将农民工的文化服务体系落到实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整合公共资源，从而让农民工群体共享社会文化发展的成果，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稳定城乡和谐。

（据刘敬严、李占平：《农民工市民化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研究》，《城市》，2012 年第 4 期）

■ 花建：文化产业对生态休闲城市建设的贡献

上海社科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花建指出，现代生态城市的理念最早出现于一百多年前的英国。进入新世纪，随着节能减排的绿色产业浪潮，生态休闲城市成为全球广泛关注的前沿发展领域。欧美发达国家和国内许多地区的多样化探索，为当前生态休闲城市的建设注入新的内涵。生态休闲城市的“现代性”植根于知识经济基础上的综合创新能力和产业转化能力，所以势必以发达的文化产业为其支柱。

对于当下中国而言，发展生态休闲城市同时也是推动经济转型、扩大内需市场的需要，在人均 GDP 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情况下，要想保持可持续发展，必须转变发展模式，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建设文化强国。目前，我国的文化产业在服务生态休闲城市建设上还有很大不足，需要从几个方面予以提升：一是大力开发生态主题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把生态多样性、自然平衡、节能减排等观念植入其中；二是以生态文化引导城市转型发展，形成宜业宜居宜文的空间布局；三是开发海洋文化，与农业文化相融合，适应全球化发展。

（据花建：《文化产业对生态休闲城市建设的贡献》，《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4 期）

■ 王宁：消费欲的“符号刺激”与消费力的“结构抑制”—— 中国城市普通居民消费张力的根源与后果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过“生活水平”和“扩大消费”等政策话语解除了居民消费欲望的意识形态禁锢，赋予其合法性。市场部门借助现代传媒，进一步催化调动居民的消费欲望。与之相应，民间的市民社会消费话语也自然地形成生长。中山大学教授王宁认为，正是这多种因素促成了中国居民由节俭主义向消费主义的转型。

不过，国家的消费话语和低成本的发展模式之间存在着内在结构张力，特别是旨在保持中国经济的比较竞争优势的政策，常常抑制着居民消费的扩大。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后很长时期内，国家的消费话语只起到了对居民消费予以符号刺激的作用，而并未转化为结构性力量，更没有带来推动居民消费的政策体系。作者认为，低成本发展模式包括低劳动力成本、低社会福利成本、低产品质量与安全保证成本、低环境污染成本等内容，其所造就的生产型社会特别是工具性人权观根本上抑制着居民的消费，并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后果：如社会挫败感，消费欲望与能力脱节；社会失范，违反乱纪、道德颠倒现象严重；社会怨恨，加剧阶层冲突严重等。

因此，要想真正扩大内需、保持可持续发展，必须转变低成本发展模式，改变投资导向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同时建设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消费者保护制度和居民公共参与制度，培养消费能力。

（据王宁:《消费欲的“符号刺激”与消费力的“结构抑制”——中国城市普通居民消费张力的根源与后果》,《广东社会科学》, 2012 年第 3 期）

6. 海外视野

■ 《法国文化研究》：策划“艾里邦”研究专辑

法国亚眠大学教授迪迪埃·艾里邦（Didier Eribon）是当代著名文化哲学家、《福柯传》的作者，在文化学者的生平研究和性别研究领域颇有建树。为了深入探讨其学术思想，2012 年第 2 期的《法国文化研究》杂志策划“有关艾里邦：阶级和性态”（‘Autour de Didier Eribon’: Class and Sexuality）研究专辑。

该专辑选刊四篇研究论文，分别为英国杜伦大学 Lucille Cairns 的《艾里邦著作对酷儿理论的校正》，华威大学 Oliver Davis 的《艾里邦，倔强的理性主义者：〈回到兰斯〉中社会学自我理解的限度》，诺丁汉大学 Jeremy F. Lane 的《从“命运之爱”到“恶心”：艾里邦〈回到兰斯〉中的爱好、习性与阶级认同》，以及斯特林大学 Cristina Johnston 的《“紧密关系民事协议”之争：从“回归野蛮”到“存在者自决生存的权利”》。此外，本专辑还刊载了艾里邦本人回应各位研究者的文章。

（据《法国文化研究》杂志网站摘编）

■ 《欧洲文化研究》：策划“反思文化研究在美国”专题

美国文化研究的理论视野和方法资源在学界颇为流行。为了反思和总结这种学术路向，2012 年第 3 期《欧洲文化研究》杂志策划了“反思美国的文化研究”的专题。美国学者 Pertti Alasuutari, Ann Gray 和 Joke Hermes 为该专题撰写了题为《美国文化研究的智囊团》的导言。在此专题下，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 Jon D. Cruz 的论文《文化研究与社会运动：美国实践中的关键联接》，通过清理美国文化研究兴起的社会运动根源，强调重建两者之间关联的重要意义。此外，该专题还包括一组对四位著名美国文化研究学者 Lawrence Grossberg，Janice Radway，Andrew Ross 和 Constance Penley 的访谈。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 Dick Hebdige 的《与亚文化同在：过去的 30 年生活》作为该专题的最后一篇，回溯了亚文化兴起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自己对此研究的学术生涯。

（据《欧洲文化研究》杂志网站摘编）